

报告文学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报告文学

BAOGAOWENXUEJINGXUAN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
{ 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

BAOGAOWENXUEJINGXUAN

2005

报告文学

GAOWENXUEJINGXUAN {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
{ 2005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 } BAOGAOWENXUEJINGXUAN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 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170-4

I .2...

II .中...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3652 号

责任编辑:吴高余 刘 方

责任校对:黄黎丽 梁 凤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8.125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30 千字 印数:1-11000 册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现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决定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中篇小说选（分上、下两卷）、短篇小说选、报告文学选、散文选、诗歌选、微型小说选和随笔选七种。每年一套，准备长期坚持下去。

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

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韩作荣同志负责；

微型小说卷由郑允钦、张越和吴雁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李东华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 朱邦芬 | 大家黄昆 / 001
- 刘元举 康锦达 | 另类名人冯有为 / 030
- 蒋 巍 徐 华 | 歌手与乞丐 / 105
- 何建明 | 我们可以称他是伟人——速记中国农民吴仁宝 / 129
- 佚 名 | 张自忠将军的最后岁月 / 194
- 张洪涛 | 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 209
- 魏荣汉 董江爱 | 昂贵的选票(节选)——“230 万元选村官事件”再考 / 260
- 舒 云 | 高考殇 / 314
- 曲 兰 | 中国人民的理财生活 / 366
- 彭学明 | 两地书,母子情 / 423
- 吕 辉 | “超女”!“超女”! / 454
- 肖复兴 | 黑白记忆——我和北大荒的几位老农 / 500
- 李 立 | 何振梁见证两岸体育交往的台前幕后 / 530
- 附录:
2005 年中国报告文学作品选目 / 569

大家黄昆

朱邦芬

从蒙养园到燕京大学

1919年9月2日,祖籍浙江嘉兴的黄昆诞生于北京。父亲黄激,当时是中国银行高级职员。母亲贺延祉籍贯湖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也在银行工作。黄昆的父母虽是南方人,黄家四个孩子却都生在北京。黄昆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名字取自北京的地名:“昆”源于“昆明湖”。

一般而言,许多著名科学家在少年,甚至童年就显示其天赋,然而,黄昆自认为是属于智力发育滞后的学生。

黄昆先后在北京蒙养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上海光华小学受到启蒙教育。他回忆自己的小学阶段,除去很早就识字,并在孩提时经常阅读小说和学会加减乘除之外,似乎说不出有什么“闪光点”,也没有学到很多的知识。他在小学期间最出色的一次表现,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时,获得全北京市小学三年级史地课考试的第五名。他回家后向母亲展示了一份关于北京城的油印讲义的奖品。为此,他始终为能熟练地说出北京城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黄昆在上海就读的上海光华小学是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延安路一条弄堂里。那是一所非常小的弄堂学校,教室在一幢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房子里,根本没有供学生蹦蹦跳跳自由活动的场地。学校没有多少学生,一位教师要同时给几个年级的学生上课。黄昆在那里从小学四年级读到五年级,一年多的表现也说不出有多么优秀。在谈到现在中小学生的负担太重问题时,黄昆以切身经历为例,认为对小学生的学习要求不必太高。

在光华小学五年级没读完，黄昆又随家搬迁回北京，暂住在伯父家中。黄昆的伯父黄子通是燕京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那年黄昆插班就读于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但只学习了半年，就转学到北京东郊通州区的潞河中学。潞河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由 1867 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八境神学院发展而来。潞河中学虽然是教会学校，但在 1927 年以后改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并取消了“圣经”这门必修课。黄燕、黄宛、黄昆兄弟三人都曾就读于潞河中学。潞河中学的校训为“人格教育”，学校每个星期都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潞河中学学生中，富家子弟较多。虽说黄家经济较宽裕，但黄氏三兄弟总是穿着自己家里做的布鞋，这种俭朴的作风得到校长在全校大会上的表扬。

黄昆认为，中学是打基础阶段，中学打的基础将会影响一个人的一辈子。对于这一点，黄昆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

黄昆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插班就读只有短短的半年，然而这半年对黄昆以后的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一天，黄昆的伯父偶然看见黄昆放学后很悠闲，就问他作业做好了没有？黄昆答道：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都已完成。他伯父说：那怎么行，数学课本上的习题一道道全都要做。自此，黄昆就这样做了，并对数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转入潞河中学后，他延续了这一习惯，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学习。大哥黄燕因为休学了两年，与黄昆同班，黄燕的数学成绩只有 30 来分。在黄昆帮助下，黄燕的数学成绩很快就过了及格线。黄昆后来回顾，伯父无意中问及他功课这件“偶发事件”，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他下课就忙于自己做习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反而使他没有养成“照猫画虎”的习惯。黄昆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从第一原理出发”就是在中学开始培养的。黄昆是潞河中学的优等生，除语文课外，他高中三年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全年级之首。

黄昆的英文极好。与黄昆合著《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玻恩(M·Born)在他的自传《我的一生》中写道：“令人惊异的是，一个中国人能够如此流利而正确地撰写欧洲文字。”“文化大革命”后，

中国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有许多中青年学术骨干,花了很大力气学英语而总不能运用自如。对此,黄昆感到不理解。黄昆回忆说:他在中学学习英语时并未花很大力气,而阅读英文小说已毫无困难。文革后的这些中青年骨干在中学以至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这也许可以作为佐证,说明中学打的基础将影响一辈子。

黄昆自己认为,他中学时代的反面教训是语文没有学好。就像大多数的中学男生一样,对于老师出的作文题,黄昆总觉得不是一句话就解答了,便是无话可说。他特别佩服有的人,对明明没什么可写的题目,还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上一大篇,而且还使别人读了以后,觉得有些意思。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黄昆明显感到,由于语文学得不好而耽误了许多事情。例如,1936年,黄昆从潞河中学毕业,拟学习工科。他报考过清华大学和北洋工学院,但均由于语文成绩太差而未被录取。黄昆在生平自述中写道:

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庚子赔款”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就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后来得知,我居然被录取。这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中文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比这更低的分数,我当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顺便可以提到,我的语文基础没有打好,多少年来,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都给我带来不小的牵累(从早年的考试到以后的写作,以至讲话发言)。近年来,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总使我想起上学时,语文老师出了题而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1937年,黄昆通过了潞河中学向燕京大学的保送考试,进入燕京大学。燕京大学与黄昆就读的通州潞河中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均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这些学校的教育虽然存在许多缺陷,然而相对比较宽松、开放和求实的环境熏陶了黄昆,使他养成了凡事独立思考,不盲目随从的习惯。黄昆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定物理学为专业。燕京大学物

2005年
先

理系成立于 1925 年,初创时就十分重视培养高层次的物理人才。燕京大学可能是中国最早培养物理学研究生的大学,同时也可能是 20 世纪 30 年代培养物理学研究生最多的大学(首批两人毕业于 1929 年,到 1941 年,共毕业物理学研究生 33 人,而北大物理系 1935 年才开始招收研究生,清华物理系抗战前只有 1 位硕士于 1933 年毕业)。黄昆入学时,燕京大学物理系有班威廉教授(William Band, 英籍,系主任)、谢玉铭教授(前任系主任,谢希德先生之父)等,虽然研究实力比清华弱一些,但课程教学与训练都不错。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张文裕、褚圣麟、孟昭英等都是从燕京物理系毕业的。燕京物理系本科课程设置门类较少,内容也较浅,课程压力远远没有清华等学校那么大。虽然这使黄昆“至今仍深感自己的物理基础底子太薄,使我理解事物有许多空白”,但是,事物都有两重性,正因为课程比较浅,分量不重,黄昆的学习得以比较主动,这对他的成长发展极为有利。黄昆年年获得最高奖学金,得到班威廉的器重。黄昆极其珍视这种主动性,他认为,无论学习还是从事研究,主动性都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大学课程不重,各科学成绩又都名列前茅,因此,黄昆有很多时间阅读各种书籍。他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叫《数学家》(Men of Mathematics),讲的是牛顿以来数百年间最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生平和贡献;另一本叫《探索微生物的人们》(Microbe Hunters),主要讲发现细菌以后的一两百年中,科学家如何一个接一个地找到引发一系列重大病症的细菌及其防治办法。尤其是《探索微生物的人们》这本书,对这些医学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描写得非常感人。黄昆感到,科学家的事业是再辉煌不过的了。科学家们对科学事业的追求和献身精神,给青年黄昆很大震撼,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并培育了他对科学事业的兴趣和爱好。此外,黄昆还广泛阅读了古今中外不少名著,尤其是英文小说。也许是爱好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生性,黄昆特别喜欢各类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也正是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英文书架上,他发现了斯诺(E·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通过这本当时在中国的“禁书”,黄昆第一次了解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共产主义革命,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影响了黄

昆的一生。

在燕京大学学习期间，黄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不久的英国教师赖朴吾(R·Lapwood)先生，他教大学一二年级的微积分。赖朴吾不仅是一位讲课出色，循循善诱的好老师，而且还组织少数优秀生成立了一个课外研究小组，研究包括这位老师当时自己也不懂而想弄明白的科学发展的新课题，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及矩阵数学。虽然大家最终都没有真正弄通相对论，但黄昆从中学到了矩阵代数的基本知识，这对他以后自学量子力学很有用。更重要的是，这项活动使黄昆的思想超越了上课知识的框架，开始感受到活的、生动的科学研究和发展，培养了他对科学的爱好与追求。这位赖朴吾先生后来成为很有成就的地球物理学家，曾多次访问新中国。

黄昆养成的主动学习的习惯以及当年燕京大学较为宽松的环境，使他能够在大学三四年级开始自学量子力学。20世纪，物理学是推动其他学科发展的带头学科，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奠定20世纪物理学大发展的两块基石。20世纪初相对论的创立，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物质和能量之间的内在联系；量子论(1900年)和量子力学(1923年以后的10年)的创立和发展，揭开了人类认识分子、原子、核子、夸克、轻子的性质和各种物态结构的崭新的一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系列新的实验发现，如黑体辐射、光电效应、放射性、电子运动轨道的稳定性，与乍看起来已经十分完善的经典理论(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动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物理)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几朵“远处天空中的乌云”使传统物理学陷入到了深刻的危机之中。1900年，德国实验物理学家普朗克(M·Planck)在分析黑体辐射实验数据时，假定光辐射能量与频率成正比且按照量子形式辐射(能量一份一份地以分立形式而不是以连续形式辐射)，得到了与实验符合的结果。爱因斯坦接受了量子的概念，1905年，用光量子的观念解释光电效应获得了成功。1912年，德拜(P·J·W·Debye)假定声波的能量也与频率成正比，比例常数也是普朗克常数，得到与固体比热实验符合的结果。1912年，玻尔(N·Bohr)将量子论应用于原子结构，提出了玻尔

原子模型,即原子内的电子处在具有能量不连续的定态上,原子在两个不同的定态之间跃迁时,吸收或辐射的频率是惟一的。这些都是早期量子论的成就。1923年,德布罗意(L·de Broglie)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了电子具有波动性的假设。1925年,海森伯(W·Heisenberg)、玻恩和约尔丹(E·P·Jordan)发表了量子力学的理论,其数学形式是用矩阵代数来表示的;一年之后,薛定谔(E·Schrodinger)发表的量子力学理论则是以波动方程形式表达的。其后,由海森伯提出的不确定关系、玻恩提出的量子力学波函数概率诠释以及狄拉克(P·A·M·Dirac)提出的关于电子相对论方程得到了一系列实验验证,于是,量子力学在1932年被基本建立起来。当黄昆在燕京上大学时,量子力学在国内还是一门非常神秘和深奥的学问,没有几个人能弄懂。黄昆对它非常向往。通过自学图书馆里仅有的几本介绍量子力学的书,黄昆初步打下了量子力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大学的毕业论文《海森伯和薛定谔量子力学理论的等价性》。黄昆的论文是论述这两种理论为何是等价的。这一工作本身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创见,不过,通过这一实践,黄昆增强了对量子力学理论发展过程的参与感,觉得自己也进入了这一科学的前沿领域,这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群英荟萃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平津很快沦陷。中国北方的三所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先迁到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于1938年春迁到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中国人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年代,西南联合大学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黄昆、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邓稼先、朱光亚、钟开莱、王浩、廖山涛、戴传曾、李整武、黄祖洽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出了中国教育史上最绚丽的奇葩。

1941年秋,黄昆在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后,经葛庭燧先生介绍,被西南联大物理系聘为助教。葛庭燧(研究固体内耗的国际著名的物理学

家,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于1937年清华物理系毕业后,去燕京大学读硕士,1940年春,他担任黄昆大学三年级的近代物理实验课的助教。葛庭燧1940年夏获燕京物理系的硕士学位后,就去西南联大工作。

抗战期间,从北京到昆明是一条漫长的路。黄昆途经青岛、上海、香港、桂林、贵州,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整整花了两个多月,才到达昆明。黄昆南下还有另一个任务,那就是护送他大哥的未婚妻到昆明,与大哥黄燕完婚。黄昆第一次单独远行,还在上海丢失了支票,幸亏母亲在银行工作,及时挂了失,才不致造成很大的损失。

黄昆到了昆明,见到了西南联大物理系的系主任饶毓泰先生。饶先生第一次接见黄昆时就对他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可以钻研学问做研究。事实也确是如此。黄昆的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据吴大猷说:“我接受了他(指黄昆),让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黄昆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物理学知识的精华。他不但听许多物理系高年级以及研究生课程,还选学多门数学系课程,如群论、微分几何等。黄昆在第一年里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收益甚丰,开阔了眼界,打下了基础。西南联大物理系师资力量雄厚,在多个分支学科都有学术造诣很深的学者,一门课可以由多位教授讲,而一位教授也可开讲多门课程,因而,研究生课程内容丰富、十分精彩,这使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可以接触到当时许多物理学发展的前沿问题。例如,“量子力学”分别由吴大猷、王竹溪、马仕俊讲授;“电动力学”由周培源、王竹溪讲授;“统计力学”和“动力学”由王竹溪讲授;“高等力学”、“量子力学与原子光谱”、“量子化学”和“物理学基础”由吴大猷讲授;“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由周培源讲授;“X射线”由吴有训讲授;“理论物理”和“原子核、场论”由马仕俊讲授;“放射性与原子核物理”由霍秉权、张文裕讲授;“光之电磁论”由饶毓泰讲授,等等。按当时的规定,要取得硕士学位,必须修满24学分的课程(70分为取得学分的最低成绩),必须通过毕业初试和论文考试。西南联

2005年
先

大的教学质量是一流的,其中给黄昆印象最深的是吴大猷先生的课。2000年3月4日,得知吴大猷先生去世的消息,60年前的听课情形又浮现在黄昆眼前:

我到达西南联大后听的第一门课就是吴大猷先生讲的“古典动力学”。听课下来后,我感到十分激动,觉得对物理学理论之精湛有了新的理解,对进一步学习物理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我当时的感受并不是一时偶发的冲动,有一件事可以作为证明。1994年,吴大猷先生通过杨振宁先生赠给我一本书,它恰好就是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所复制的、我在1941年听课时吴先生的《古典动力学》讲稿。这本十分详细的宝贵资料充分显示吴先生讲课的深厚功底和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他赠给我的这本《古典动力学》讲义的扉页上,吴先生亲笔写了下面的一段话:“此袋内乃1941年秋季在昆明西南联大所授古典动力学课的讲学笔记……该课中约有20人,有研究生黄昆,四年级学生杨振宁、张守廉、李荫远、黄授书等人,对着这样一群学生讲古典物理中最完美的一部,是最愉快的一大事也。”这是吴先生在1993年写的话,事隔整整半个世纪,他诲人不倦、乐于教书育人的欣喜心情仍溢于言表。

由于张守廉的缘故(张守廉在燕京大学比黄昆低一届,早一年转学到西南联大),黄昆很快就结识了和张守廉同班的杨振宁。杨振宁1938年高中尚未毕业(仅念完高中二年级),就考取西南联大化学系。他之所以报考化学系,是因为他没有学过高中物理。在准备入学考试时,杨振宁发现自己对物理学更有兴趣,于是入学时就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学习思考风格迥异,但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他们一起上吴大猷和其他许多先生的课,通过课堂和课后的交往,他们加深了对彼此人品与学问的了解,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人们称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为西南联大的“三剑客”。1942年夏天,他们都报考了研究生。当时,西南联大招收的本科生是不分三所学校的,但研究生根据导师所属学校

则分属不同的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杨振宁和张守廉分别报考了清华大学王竹溪先生和周培源先生的研究生,黄昆则报考了北京大学吴大猷先生的研究生。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人虽然导师不同,但所学课程大多是共同的。黄昆是西南联大时期北大研究院物理系毕业的惟一的一名理学硕士。

西南联大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教室是铁皮屋顶泥巴地,窗户也没有玻璃。下雨时,叮咚之声不停;刮风时,师生必须用重物把纸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研究生一般都住在学校的泥墙草顶的茅屋里。但是,正如杨振宁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所写到的:

我们的生活是十分简单的。喝茶时加一盘花生米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苦楚;我们没有更多物质上的追求与欲望。我们也不觉得颓丧;我们有着获得知识的满足与快慰。这种十分简单的生活却影响了我们对物理的认识,形成了我们对物理工作的爱憎,从而给我们以后的研究历程奠下了基础。

当时研究生的补助金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必须寻找教学职位来增加收入。杨武之的朋友徐继祖先生是昆华中学校长,他安排黄昆、杨振宁、张守廉三个人分享昆华中学的一个教员职位,并提供一间住房给他们三人合住。昆华中学距离西南联大差不多3公里。他们白天通常在大学校园里上课、吃饭、上图书馆,晚上才回到房间睡觉。因为大学校园内不供应开水,他们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晚饭后回宿舍前,花一到两个小时在茶馆里喝茶。后来,他们泡茶馆的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喝水,而是为了交流。当时西南联大的学术讨论风气盛行,黄昆又从小酷爱争论,他们谈天说地,喝茶时争论不休。可以说,他们的课余时间主要就是在茶馆里头度过的。正是通过学术讨论和课外无数次的辩论,黄昆、杨振宁、张守廉才真正认识了彼此,并从此结下长达60年的深厚情谊。杨振宁在一篇为祝贺黄昆70寿辰而撰写的题为《现代物理和热情的友谊》文章中回忆道:

2005年
说

从那些辩论当中,我记得黄昆是一位公平的辩论者。他没有坑陷他的对手的习惯。我还记得他有一个趋向,那就是往往把他的见解推向极端。很多年后,回想起那时的情景,我发现他的这种趋向在他的物理研究中似乎完全不存在。

我们无休止地辩论着物理里面的种种题目。记得有一次,我们所争论的题目是关于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这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一个重大而微妙的贡献。那天,从开始喝茶辩论到晚上回到昆华中学;关了电灯,上了床以后,辩论仍然没有停止。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天晚上争论的确切细节了,也不记得谁持什么观点。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三人最后都从床上爬起来点亮了蜡烛,翻着海森伯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来调解我们的辩论。

杨振宁又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想起在中国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风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在物理学里的爱憎主要是在该大学度过的六年时间里(1938—1944)培养起来的。诚然,后来我在芝加哥接触了前沿的研究课题,并特别受到费米(E·Fermi)教授风格的影响。但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

而黄昆在最近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谈到西南联大时期与杨振宁的交往时说:

“跟他讨论问题,我觉得在当时对我有很大的好处。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处是少一点,因为毕竟他的天赋更高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那儿吵,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完全平等的。”

他们还讨论和争辩天下的一切事情:从古代的历史到当代的政治,从大型宏观的文化模式到新看的电影。黄昆是一位英文小说迷,他向杨振宁

介绍了许多英美作家和他们的小说，如康拉德(J·Conrad)、吉卜林(R·Kipling)、高尔斯华绥(J·Galsworthy)等等。除了从学校图书馆借书，他们还从当时在昆明随处可见的卖美军剩余物资的地摊上购买英文袖珍本的旧书。

1943年的春天，他们三个人觉得每天在大学和昆华中学两地间奔波很不方便，便放弃了昆华中学的工作，各自搬进大学的研究生宿舍。但是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仍保持经常见面。

黄昆在西南联合大学硕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是吴大猷先生。当时，黄昆在量子力学方面已有相当好的基础，正好能适应吴大猷进行学习和研究的要求。应该说，在西南联大，黄昆是受教于吴大猷先生最多的学生。他不仅是吴先生的研究生，而且在做研究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吴先生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当时为了躲避日本对昆明的狂轰滥炸，西南联大的大部分教师分散住在昆明市郊区的农村里。吴大猷夫妇住在一个名叫岗头村的小村子里。岗头村距离学校约五公里，吴先生或步行或乘简易马车往返于联大与岗头村。1943年春的一天下午，吴大猷搭马车去联大上课。路上，由于马受惊，吴大猷从马车上跌了下来，以致后脑受震，卧病在床长达四个星期。吴大猷夫人阮冠世女士由于长期患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极需吴先生照料，吴大猷病倒后，她又急又累，待吴先生病稍好些，阮冠世却倒了下来。无奈之下，等到筹措到一笔钱后，吴先生便陪夫人住医院，并请黄昆代为看家。当时因为抗战，联大教授的生活十分艰苦，吴先生因为夫人的病开销尤其大。为了稍稍改善一下生活，吴先生曾买了两头小猪喂养，打算养到年底卖掉变换些钱用。后来小猪死了一头，黄昆住到岗头村时，剩下的一头已长得相当大了。猪长时间放养在野外，凶猛无比。而每天晚上，黄昆都得将它赶进猪舍。那真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简直就像一场战斗。黄昆来信报告猪的情况，吴大猷也想不出好办法，只得回信叫黄昆去岗头村找人把猪卖掉，“也无心去计算为喂猪买了多少糠，花了多少本钱，到底是赚，还是蚀？”

吴大猷夫妇在岗头村住一排五间的泥地泥墙小屋。在这样的陋室中，